

长沙文化史料专志

长沙市文化局 编
长沙市政协文史委

继承优良传统
建设历史文化名城

臧宝山
一九九七年
十二月

长沙市政协主席臧宝山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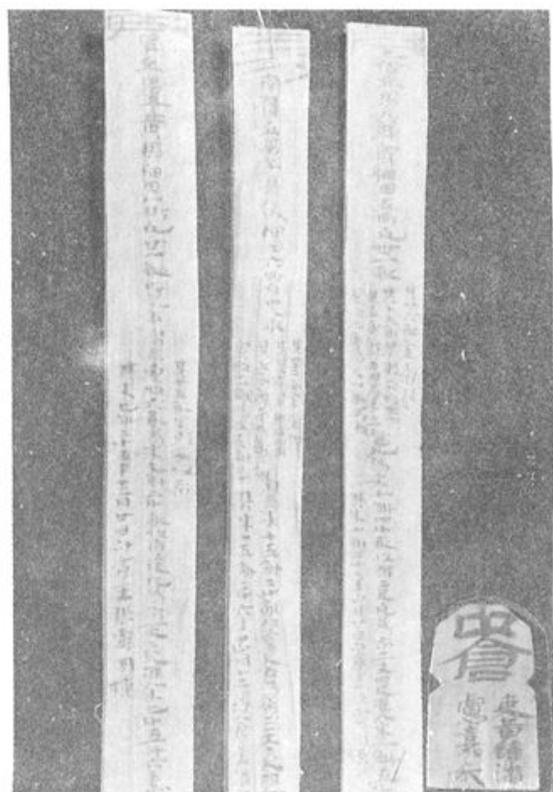


1955年,长沙市文化局成立时的办公楼原址。
(何定球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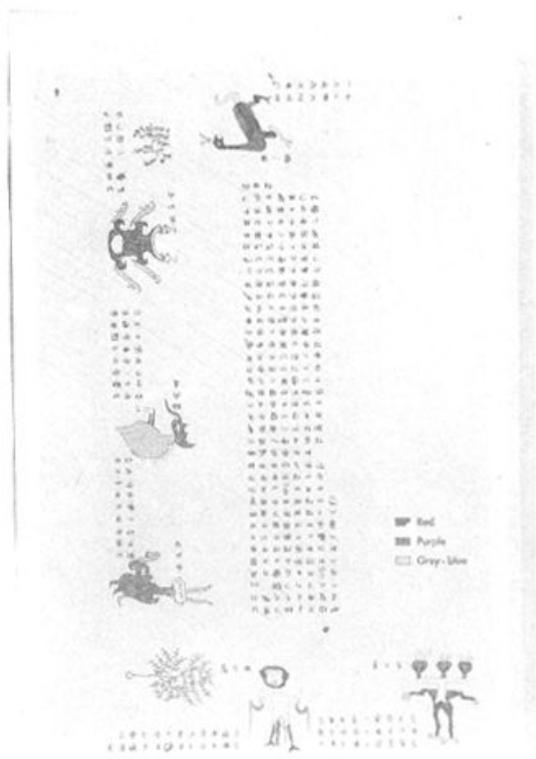
解放初长沙市戏剧改革讲习班结业证书及学员证
章。(何定球摄)

长沙三国孙吴纪年简牍



三国吴简出土地——古井J22号发掘现场。

四十年代长沙子弹库楚墓
中出的战国缯书图为复原
后的缯书（局部）。



文化市场管理



群众文化之一：长沙棠梨镇陶公庙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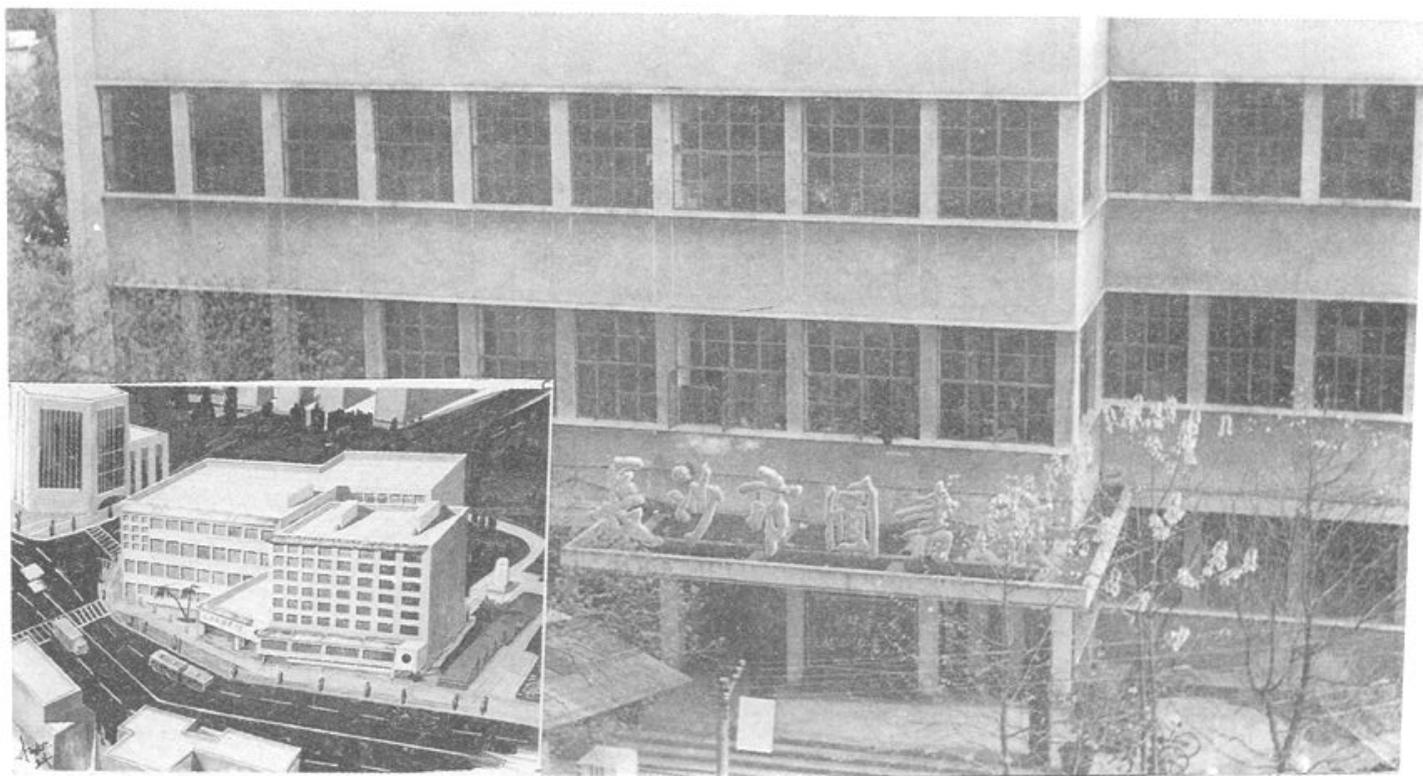
群众文化之二：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上海京剧万里行”应邀来我市演出。 新建的长沙电影城



1996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剧目湘剧《布衣毛润之》剧照。



1986年建成的定王台长沙市图书馆,及1997年新馆
规划图。

喜人春色满长沙

——近半个世纪来长沙地区文化事业综述

政 文

长沙,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孕育着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人民,也培植着一代又一代璀璨丰富的文化。长沙的文化人极富抨击黑暗和追求光明的性格特征。解放前,他们虽处于社会的底层,却不屈服反动势力的高压,运用文化艺术这一有力的武器,进行着前仆后继的战斗。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沙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就曾以《猛回头》、《三荒记》等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败;土地革命时期,《文市大捷》、《红军歌》、《暴动歌》、《妇女解放歌》等成为宣传鼓动群众,创建工农红军的革命舆论;抗日战争时期,《倭奴毒》、《血溅沈阳城》、《旅伴》、《新江汉渔歌》、《孙方政救国》等汇成一束束投向日本侵略者的匕首;解放战争时期,《工农记》、《面粉筑路》、《猪油变麻石》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尖

锐的鞭挞。长沙文化人这种抨击黑暗、追求光明的性格特征，在半个世纪变革社会的波谲云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湖南和平解放，是长沙文化人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他们走出苦难的深渊，义无反顾地置身于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一支生机勃勃的文化艺术队伍，融汇于巩固和建设人民共和国的巨大洪流之中。在冰天雪地的治湖工地；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在深山峻岭的革命老区；在热火朝天的基建工地……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飘落着他们引吭高歌的湘音。在文化艺术走向社会，接近人民的过程中，长沙文化人的性格特征也完成了从抨击黑暗、追求光明到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的转变。正是这种转变，使他们毫不动摇地接受和执行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困难前不退缩，在坎坷中能奋起，为长沙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铺设出一条通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康庄大道。

硕果累累的戏曲艺术事业

近半个世纪以来，长沙的戏曲艺术经历了几番风雨、几度沉浮的发展过程。从50年代的戏曲改革，60年代的说新唱新，70年代人的“文革”灾难，80年代人的文艺复苏，到90年代的硕果累累，长沙的戏曲艺术工作者，终于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全国性的戏剧、曲艺汇演中十二度获奖，并登上了文华奖和“五个一工程”的高峰。

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改人、改制、改戏”为戏曲改革的主要内容。这“三改”是长沙戏曲艺术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基础课。“改人”，使所有从事戏曲艺术的演职人员，通过戏改讲习班的学习，基本上达到了从过去的卖艺糊口到人民文艺工作者这一定位的转

变；“改制”，使当时由艺人组合的楚南、群力、艺联三个民营湘剧团和新义花鼓戏剧团逐步实行民营公助和由政府文化部门派出驻团政治指导员，零散的曲艺艺人也成立了曲艺联组，使民营演出团体过渡到由政府文化部门直接管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改戏”，使艺人对传统戏曲剧目的继承和发展、糟粕与精华以及去芜存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开始革除剧目中存在的某些宣扬封建迷信和庸俗低级的内容和表演。“戏改”促进了长沙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经过整理、改编的《珍珠塔》、《追鱼记》、《东郭救狼》等甚受观众欢迎的戏剧和曲目。特别是在全国首届戏剧观摩汇演和全国首届曲艺会演中，以崭新的面貌登上首都的文艺舞台，演出了湘剧《琵琶上路》、《打猎回书》，花鼓戏《刘海砍樵》和弹词《贺庆莲》、《武松打虎》，评书《炸龙口》、大鼓《春旺是个好姑娘》，戏剧荣获两个二等演出奖，演员徐绍清、陈剑霞、彭俐侬、何冬保、肖重珪分别获得了一、二、三等演员奖。曲艺汇演没有设奖，却获得一致好评。舒三和等被推选到中南海向中央首长汇报演出。戏曲艺术的繁荣，促进了长沙地区戏曲演出团体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长沙市京剧团、市越剧团、市文艺工作团（后改称歌剧团）、市曲艺队、长沙县花鼓戏剧团、望城县湘舞花鼓戏剧团相继创立，加上市内的长沙湘剧一、二、三、四团和长沙市花鼓戏一、二团，到50年代末期，长沙地区已拥有12个戏曲演出团体，成为活跃于城乡、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的劲旅。然而，戏曲艺术发展的大好形势并没能维持多久，1957年一场全国性的“反右”运动，波及文艺界，长沙市文化局首任局长，也是湘剧《追鱼记》的改编者康德和市戏工室主要负责人黄曾甫，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分子”，戏曲剧团的演职人员中也有不少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曲艺界，一段批评官僚主义作风、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相声《活菩萨》，却带来

了深重的灾难，作者赖钰和发表这件作品的《职工文艺》编辑唐挥之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株连到发表评介文章的《长沙日报》有关人员和这段相声的演员、长沙市公共汽车公司职工马信、铁牛，承受了没完没了的批判煎熬。这次“反右”，长沙市文化艺术界从领导到群众，从专业到业余，无不深受其害，文艺工作者的心头蒙受着痛苦的阴影。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修正了这段被颠倒的历史。

60年代初，在中央文化部门提倡说新唱新的推动下，长沙戏剧界出现了大演现代戏的热潮，创作上演了湘剧《山乡巨变》、歌剧《幸福源》、花鼓戏《活人碑》等现代戏，一度同时演出的“三红”（湘剧《红灯记》、歌剧《红珊瑚》、花鼓戏《红色营业员》）风靡长沙舞台达数月之久，将现代戏的演出推向高潮。曲艺界在演出《新旧南门口》、《红军进长沙》等创作曲目的同时，一大批现代长篇书目《烈火金刚》、《桥隆飙》、《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成为长沙城内10多个书场久演不衰的曲目。

70年代，“文革”浩劫给长沙戏曲界带来第二次极为深重的灾难，先是长沙市文化局一连两任文化局长无辜地成为文艺黑线的头目，接着是一批被扣以“三名三高”的知名演员成为“牛鬼蛇神”，无休止的批斗折磨着他们的身心。紧接着撤销剧团，遣散演职人员，使这些多年来为长沙戏曲艺术事业的发展竭尽心力，作出很大贡献的文艺工作者，献艺无门，衣食无着，境遇凄凉。在这场浩劫中，长沙市文化局副局长戴伯淳，著名戏曲演员余福星、舒三和、欧德林等，都未能等到“四人帮”的覆灭而离开人世。尽管如此，长沙戏曲艺术工作者丝毫也未动摇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的初衷，在重建长沙市文艺工作团后，他们又以极大的热情移植当时仅能上演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革命现代戏，为久疏文化的长沙观众献出一份心力。与此同时，戏剧

作者和演职人员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开始编演一批小戏，湘剧《园丁之歌》遂脱颖而出，在湖南省戏剧调演中好评如潮，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将此剧拍成舞台艺术片（由湖南省湘剧团演出）。然而，这出以“没文化怎能担革命重担来承担”为主题的小戏，还没有与观众见面，就被“四人帮”的头目江青扣上“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等罪名，发出国务院文化组六号文件，在北京、湖南等四省市展开对湘剧《园丁之歌》的围剿。长沙戏剧界再次面临被讨伐、受批判的深渊。尽管毛泽东主席看过《园丁之歌》影片之后，鼓掌称好，并没能改变“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直到他们沦为历史罪人之后，党的拨乱反正的春风，才使湘剧《园丁之歌》重见天日。

80年代，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的长沙戏曲工作者，在市、县戏剧演出团体和市戏曲工作室相继恢复建制后，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创作和演出的艺术实践之中，一大批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剧目，登上了长沙城乡的舞台。湘剧《湘潮》、《玛丽娜一世》，歌剧《骄杨》、《三个女儿的婚事》，花鼓戏《新螺女》、《谷兰吟》、《和尚庙的喜事》、《翠湖春》等等，在观众中和戏剧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骄杨》在北京《人民戏剧》发表后，全国各地就有40多个戏曲团体移植上演。《灯花》在全国歌剧交流演出中荣获一等奖。栾保良、杨建伟、葛平分获演员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评价《灯花》是“上乘之作，很有新意”。长沙歌剧终于实现了继湘剧、花鼓戏之后，成为在全国汇演中获奖的剧团。特别是花鼓戏《海哥和九妹》，远涉重洋，前往日本演出，给东邻观众欣赏多姿多采的三湘文化的机会，出色地完成了文化使者的任务，开长沙戏剧界走出国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先河。专业曲艺团体虽未能恢复，但曲艺艺术工作者并没有沉寂，他们默默耕耘，创作和演出了《第二次握手》、《护相》、《鲁迅

藏稿》等优秀曲目,《刘海与刘江》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相声电视邀请赛上获得“荧屏奖”,《查帐记》在全国新故事大赛中获得铜奖。民间说书艺人在说唱传统和新编书目的同时,引进了《萍踪侠影》、《书剑恩仇记》等港台长篇书目,给长沙听众以耳目一新之感,改革开放的气息终于吹进了古老而封闭的书场。

90年代,随着全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长沙戏曲界在80年代文艺复苏的基础上,开始向戏曲艺术精品的高峰攀登。由于近20年来戏曲队伍发生了巨大变化,一部分造诣较高的戏曲艺术家因年事已高退出舞台,而长时间由于“文革”等种种原因,很少培养出可以接班的新秀。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文化主管部门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的措施,将原有湘、花、歌三团合并组成长沙市艺术剧院。尽管剧种有别,但在演员调配、戏剧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仍有相通之处,能调动大批中年艺术骨干各尽所长去创造戏曲精品的积极性,从而使长沙具有代表性的湘剧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马桑树》首途北京,就获得了首届文华新剧目奖。接着新编历史剧《铸剑悲歌》,又在昆明举行的全国戏剧节上获得创作演出奖。随后《布衣毛润之》再去北京,二度获得文华剧目奖、文华作曲奖,主演曹汝龙也获得文华演员奖和梅花奖。紧接着经过作者和全体艺术工作者的加工,拍成电视片,经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并进入全国文化艺术最高层次的奖项“五个一工程”,长沙湘剧艺术终于攀上有史以来的高峰。这一时期,长沙曲艺、杂技艺术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母亲颂》在全国青年相声邀请赛上获得创作奖,二、三等演员奖和组织奖;《换岗》在全国“三书”(评书、快板书、山东快书)电视比赛中获得“荧屏奖”;《晃板》、《三人小顶》在全国杂技调演(华东片)中双获二等演出奖。特别是从书场说书出道的曲艺作家戴云,创作和出版了《密令追踪》、《闯王余部复仇记》等25部中篇通

俗小说和《南岳龙蛇》、《消魂一指令》、《花剑情仇》、《寂寞江湖》、《掷剑踏莎行》等21部长篇武侠小说，逾1000万字。其中《南岳龙蛇》、《密令追踪》由上海、桂林电视台摄制为电视连续剧，《消魂一指令》在北京举办的海峡两岸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中荣获“铜剑奖”。随着市内歌舞厅的兴起，曲艺、杂技、小品进入文化市场演出后，每年观众达50余万人次。一批受到观众欢迎的曲目，经湖南文化音像出版社录制成《乡音难改》等4个盒带，在全省城乡发行50多万盒，使群众喜闻乐见的曲目进入千家万户。上述成就无疑地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戏曲界以宽松的环境和使戏曲艺术工作者解放思想进行艺术创作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而取得的。

丰富多采的群众文化事业

长沙地区城乡的群众文化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解放前留给长沙地区的群众文化机构，仅有残缺不全的省立长沙民众教育馆和长沙县民众教育馆。文化行政部门从50年代到80年代逐步完成了市文化馆（后改名群众艺术馆）和县、郊、内四区文化馆以及街道、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加上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行业工人俱乐部、少年之家和市文联及各协会的建立，形成了覆盖长沙地区工矿、农村、商店、街道、学校的群众文化机构网，成为动员、组织、指导和促进各阶层人民群众进行文化活动的主要力量。长沙县文化馆被评为全国农村文艺工作先进集体，一批文化馆、站受到省、市政府的表彰，从而使长沙地区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

群众文艺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举办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学习班和创办《职工文

艺》、《长沙演唱》、《长沙艺苑》、《雅俗报》、《长沙文艺》和县办《浏江文艺》、《浏阳河》等群众文艺刊物，为作者提供发表园地等措施，培养了数百名文艺创作骨干，经市文化馆及其刊物组织和征集的作品达13000余件，不少作品在省以上报刊发表，仅“文革”前经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戏剧、曲艺单行本就有《两朵红花并蒂开》、《风雪赴会》、《水莲渡》、《岳北风云》、《假阔佬》、《长沙滚筒快板》等26种，在全国性报刊发表的有《红旗高举》、《两瓶酒》等多件。1981年国际儿童画展中，长沙市有11名小作者的14件作品，被送往芬兰、西德、日本等国家展出，获得3项国际金、铜质奖。在这种从城市到农村，从成人到少年的波澜壮阔的创作活动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如创作长篇小说《百侠闹江南》等的优秀业余作者，使长沙地区的群众文艺创作得以长盛不衰。

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活动。50年代，通过新歌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响彻市内的大街小巷；在农村，藕塘乡组织的村姑合唱队，以《万户千村合作化》、《我爱我的小黄牛》等歌曲，活跃在田间、屋场。60年代的全市革命歌曲比赛，参加演唱的达140多个单位，工人、农民、战士、店员、干部、学生与老红军合唱队、通泰街老妈妈合唱队等近1万人，联袂登台，《歌唱祖国》、《团结就是力量》、《我是一个兵》等激昂、悠扬的歌声彼起此落。80年代，群众歌咏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建设者之歌”、“主人翁之歌”、“红领巾之歌”，“学生合唱节”等专题形式，在演唱技巧上也从齐唱发展到多声部、混声合唱等新的层次。90年代举办的通俗歌曲大奖赛和卡拉OK比赛等活动，在群众性音乐领域中飘扬出改革开放的气息。

盛况空前的群众文艺汇演。50年代，市、区文化馆组织的业余文艺演出即达4962场，观众160余万人次。这种既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又培养、提高业余文艺积极分子创作、表演才能的演出，

为先后举办的职工业余文艺汇演、民间艺术观摩汇演、民间音乐舞蹈戏剧汇演、群众业余现代小戏调演、少年儿童文艺调演、民间曲艺汇演等创造了条件。如60年代初举办的全市汇演就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群众业余文艺大检阅，各条战线分别演出了160多场，各种形式的节目2400多个，从中选拔了一批优秀节目参加市汇演的15场演出。通过汇演这一从普及到提高的过程，长沙群众文艺在全国和省的汇演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弹词联唱《霹雳一声春雷动》、快板《打老鼠》晋京参加全国首届职工文艺汇演，并到中南海为朱德等中央首长演出，随后又入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艺术纪录影片，实现了长沙群众文艺首次进入大雅之堂和走上银幕的历史性突破。歌舞《未来的世界冠军》、话剧《毕业前夕》、花鼓戏《靠社》、弹词联唱《三块假光洋》、相声《入地无门》、莲花闹《南门口》、表演唱《揍下U—2飞机来》、小演唱《集体生产有奔头》与《钱和米》、快板群《勤俭办厂一枝花》、舞蹈《觉醒》等一批丰富多采的节目，在省举办的首次长、衡、株、潭四市业余文艺调演中，一举获得4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和7项三等奖；又如90年代初，弹词联唱《中流击水显风流》、快板《红旗闪闪上井冈》和《受骗记》、顺口溜《票》、小品《钱老大逛酒吧》等在全省曲艺调演中，获得9项一、二、三等奖，其中《中流击水显风流》还荣获中央文化部群众文化的最高奖项“群星奖”。

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专题群众文艺演出。每年“五一”、“六一”、“七一”、“十一”和元旦、春节，各级群众文化部门组织、举办的游园和文艺演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各阶层人民群众，共享节日欢乐。丰富多采的演出，表达出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各种内容的专题文艺演出，如“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场”、“赞雷锋”、“歌唱焦裕禄”、“五讲四美树新风”、“计划生育好处多”、以及“普法宣传”等文艺